

从大清到中华

最真实的普洱茶

杨凯 刘燕 李晓梅 / 著

其認狀茶幫各號等今於

雲南總商會台前實結得本幫採造普洱

子元茶純係以普洱本山所產茶葉造採

論心底面均係一律不能以景谷貴州猪街

等處所產之茶攪雜採造其元飛內飛第

面亦遵

總商會所議式樣自行照印普洱特產等

以示區別如違自甘按照

總商會議決立案條款處罰是實

云南出版集團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从大清到中茶

最真实的普洱茶

杨凯 刘燕 李晓梅 / 著

其認狀茶幫各號等今於

雲南總商會台前實結得本幫採造普洱

子元茶

元茶元茶元茶元茶

產茶葉造採

論心底

心底心底心底心底

景谷貴州猪街

等處所

處處處處處所其元飛內飛第

面亦導

亦面亦面亦面亦面

總商會所

百所百所百所百所

洱特產等

以示區

另女道自七本具

恩商會議決立案各款處罰是實

云南出版集團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大清到中茶：最真实的普洱茶 / 杨凯，刘燕，李晓梅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22-05675-6

I. 从… II. ①杨… ②刘… ③李… III. 茶—历史—研究—云南省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3883号

责任编辑：王 梅 李景霞

装帧设计：王睿韬

责任印制：段金华

书 名	从大清到中茶——最真实的普洱茶
作 者	杨 凯 刘 燕 李晓梅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675-6
定 价	18.00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从大清到中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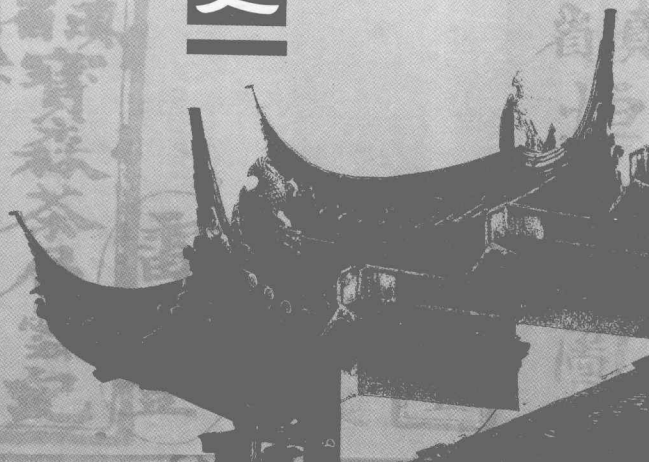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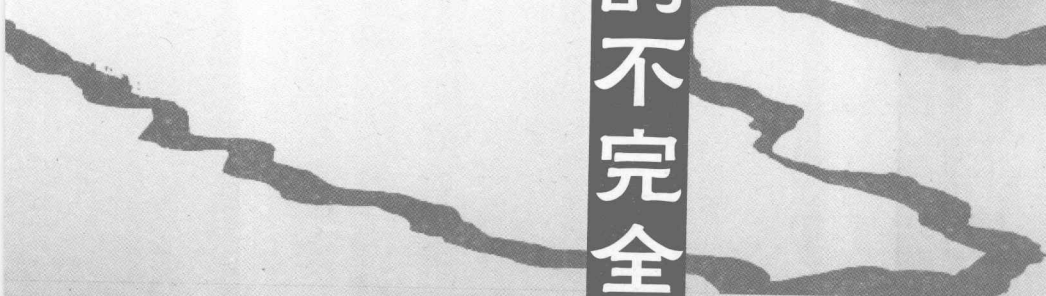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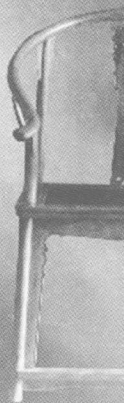
【目录】

『壹』清代普洱茶的不完全史	/1
• 大清普洱茶拾珠	/3
恢复与整饬	/3
京师尤重普洱茶	/17
普洱茶走出六大茶山	/32
• 普洱贡茶搜秘	/38
• “钱王”和普洱茶的公案	/52
• 实业救普洱	/58
• 普洱茶假冒史话	/77
『贰』现代普洱茶杂录	/83
• 下关沱茶博物馆精品赏析	/85

建厂文物	/85
茶样精品	/90
• 大理名茶——感通茶	/94
• 一个被遗忘的云南茶人——朱文精	/99
• 中茶公司与云南中茶公司商标的一段公案	/104
• 腾冲的茶业	/109
• 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1938—1950年）	/115
• 七子何时“圆”成“饼”	/128
• 感受“猛景紧茶”	/132
『叁』 当代普洱茶断想	/137
• 普洱茶沉思录	/139
打假，但决不应打“老”	/139
“家乡宝”的“夜郎”情结	/141
传统与科学的分歧	/143
• 普洱茶行业要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145
• 老茶鉴定是瓶颈	/149
• 从普洱茶系列图书的策划，谈选题的纵向拓展	/152
原创和引进	/152
建立品牌与跟风	/153
向纵深拓展	/155
主要参考书目	/157
后 记	/159

清代普洱茶的不完全史

『壹』



大清普洱茶拾珠

雷平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用了这样的标题：“真想回到清朝去！”大清朝，对普洱茶来说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时期呀！一种“淪作土气”的大众茶，一跃而变为贡茶，变为“京师尤重之”的奇货，变成笼络四夷的恩物，这里面凝聚了多少人的光荣与梦想呀！

但是，当我们认真深入进去，以一个清朝茶农的身份回到那个时代，我们在看到财富，看到梦想的时候，同样还能看到盘剥，看到痛苦，看到尔虞我诈，甚至看到鲜血和死亡。当一个东西的优点显现出来，它一定会成为众人追逐的目标，尤其是当它具有利益的时候。清朝的普洱茶社会和我们现代一样，埋藏了许多人的爱与恨，青春与奋斗，也成就了一些人的财富与功名。当然，它也留给我们无尽的话题和永远也品不尽、道不明的时间的滋味。

恢复与整饬

云南是茶树的原生地，千百年来，古老的山茶属植物和在分类上位于它下一层的茶组植物一直在这片大地上生息、变异、繁衍着。这使云南的土著居民很早就对茶的功用、驯化有了认识。

云南人很早就知道了茶叶的优点，在不同的地区用一些很奇特的方式生产和利用着大叶种茶树资源，也就是说对分类上的普洱茶种早有利用，但是，植物分类学上的普洱茶和市场上所销售的普洱茶是不能画等号的。植物分类学上的普洱茶种比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普洱茶范围小得多。本书所讨论的普洱茶是一个一般称谓，它是在生产、销售中慢慢形成的，起初，它是对某一地域茶叶的称谓，后来，逐渐演变成对某一类茶叶的统称。

茶叶在贸易水平上的利用，云南肇始于明代。普洱茶的称谓正式出现在文献中也是在这一时期。这也许与中原文化的进入、大量屯田和戍边民众带来中原相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习俗有关。在《徐霞客游记》的“滇游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末云南饮茶风尚的流行程度。

在徐霞客还没有被抬出云南的时候，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已大张旗鼓地进攻北京了。随后，1659年，吴三桂进入云南，明朝最后的皇帝永历帝错听沐天波的建议，逃往缅甸，被扣在缅甸首都阿瓦城（在今曼德勒以南）。大西军悍将李定国、白文选只有兵临阿瓦城下，要求送还永历帝。缅甸派边牙鲂、边牙猓统帅象阵进攻。李定国手执朴刀，独立窄桥。为首花象向他扑来，李定国镇定自若，随象鼻空档跃起，挥刀砍去，象鼻应声落地。花象负痛反奔，群象同时后逃，缅阵大乱。李定国趁势出击，斩杀缅兵万计。然而，阿瓦城三面环水，一面高墙深垒，李定国无法攻破，同时，粮草又补给不上，他只有退到了滇西边境。最终白文选投降，李定国病死于茶山猛腊（《清实录》中记载，据车里宣慰使刀木涛报告：李定国病死于景线）。我们无法知道，吴三桂大军在猛腊围剿的时候，是否接触过普洱茶，但是，就在他在滇西南和缅甸围剿李定国的时候，也就是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儿墨勒根赉方物及西蕃蒙古译文四通入贺三桂，求于北胜州（今永胜县）互市茶马”。

此时，平西王吴三桂正想拉拢达赖喇嘛势力，遂极力向中央政府游说，认为尽管云南历史上没有北胜州开市的先例，但云南因为征战的需要，正需买马，与其跨越千里，去陕西买马，还不如在云南开市易马。清政府户部给了这样的答复：“《会典》所载，招商中茶，每七斤蒸晒一匳，运至茶司，官商中分，商茶给卖。令市马则例：户部给引与茶马五司，五司招商发引产茶地方采买。茶商到司，半贮茶库以备易马，半听商人自卖，并不动用公帑。”户部认为，云南茶马市所需茶叶是用本省茶还是在外省采买，交易政策是否沿



用川、陕、西宁等五茶马司的惯例，由吴三桂斟酌。此时，清朝政权刚刚建立，所说的《会典》指前朝的《明会典》。吴三桂又上言：“北胜州不通江道，远省商贾必不愿来。至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别省采买，则肩担背负，跋涉万山，为数有限难以比照西宁，亦不能告领户部茶引。或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每两税课银三分。如贸易亏损番人者，许互市官解处；若夹带私茶及私买马匹者，国有成宪。”吴三桂的提议获得通过。

在古代，中原交通以牛车、水运为主，它们的好处是运量大，便宜。但水运受限于航道，牛车速度太慢，用马车则更有优势。一旦“中原变乱，边患无常之际，马之为用，更重于平时”。因此，我们常常将兵马两字连用，将它当成国之利器，关乎社稷安危。然而，良马主要产于塞外，《汉书》有如下记载：“虏皆骑马，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如决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今莫如市马。”当时用来买马的主要是金银和丝绸，然而金银有限，丝绸也因制作困难、中原市场较大而供不应求。到了唐代，种茶业兴起，一种年年生生不息之农副产品，因有解青稞之热、肉食之腥的奇效，成了边疆贸易的重要等价物，“睦邻不以金帛，控驭不以师旅，以市之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为茶乎”。茶马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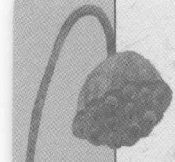
汉唐易马，主要是西北之马，以茶易马，则始自唐贞元之末（约公元800年）回纥驱马入朝。

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朝在川陕等地设立买马司，年交易战马一万至两万匹。此时，仍然以交易西北的河西马为主。

南宋时期，陕西失陷，买马的重心转移到西蕃，这个西蕃既包括吐蕃（今西藏），也包括大理（今云南），卖给云南的茶主要由设在广西桂林的静江军茶马司负责。

元代的统治者本来是北方游牧民族，战马可以自给，他们并不需要以茶易马。





明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西、宁夏和四川进行。此时，云南已经是中央政府管辖的省，但我们仍然看不到云南茶叶大额贸易的记录。唯一与现今云南有关的是当时归四川马政管辖的乌蒙（现昭通）茶有一定产量。同时，离云南最近的永宁（现泸州叙永一带）及其附近出产“剪刀粗叶，惟西蕃夷獠用之，自昔商贩未尝出境。四川茶盐都转运司言：宜别立茶局征其税，易红缨、毡衫、米、布、椒、蜡，可资国用……于是永宁、成都、筠连始设茶局矣”。笔者在与别人合作的《云南普洱茶》一书中，曾将永宁误做云南宁蒗县的永宁，是笔者治学不严之过，笔者在这里向读者致歉。虽然这个永宁不在云南境内，但它的茶叶、土货贸易应当与现今的云南昭通有一定关联。

明代对茶叶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规定民间存茶不得超过一月之用。至于敢将茶叶私自贩卖进藏区的，那是杀头大罪。朱元璋的女婿欧阳驸马就因为私自卖茶出境而被处死。因此，明代如有云南茶叶进藏，那在正史中是一定要有记载的。

这里我们看到，清代以前云南是没有茶马贸易的先例的。清朝初年，普洱一带产茶也不多，因此，吴三桂才准许云南茶商在云南驿领取引票，到四川、湖南、湖北采买茶叶，再回北胜州茶马市场与藏区交易战马（更多是交易土产）。我们无法判断，吴三桂此时是否是出于私心在为自己叛清准备战马，抑或是出于公心为大清朝调解和西藏喇嘛的关系，为巩固边疆、发展云南的经济进行谋划。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吴三桂做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

与此可作参照的是，此时中俄关于领土和贸易的《尼布楚条约》还没有签订，但湖北的老青茶已悄悄渗透进了俄国，一条中外贸易的骆驼茶路正在形成。二十多年后，茶叶就光明正大地在这条路上有控制地贩运；这更大地刺激了两国的经济和对沿线部落的控制。

另一点也很有意思，其他茶马司所用之茶为“七斤蒸晒一篋”。这种茶应该是四川边茶形制，采茶时用镰刀连叶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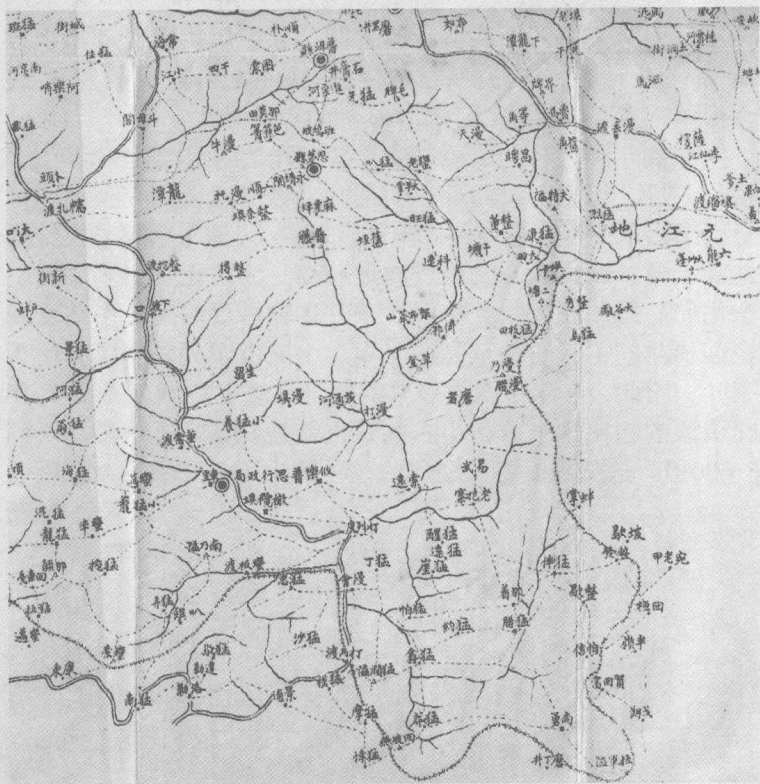
茎一齐割下，经蒸、揉、发酵，再压成长方枕头型紧茶，外包裹竹篾。而云南茶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最终定下的形制却极大的不同，“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这种每圆七两（旧制），每筒七圆的茶就是今天的七子饼茶！我们不知道清政府为什么这么喜欢“七”这个数字：川、陕茶七斤蒸晒一篋，云南茶每圆七两，每筒七圆。除了解决藏民“不识权衡”，简化计算，方便税收，避免称量，减少藏汉纠纷，不致亏损“番人”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考量呢？

肇始于吴三桂的滇藏茶叶交易一开始的定额是3 000引，这里，“引”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茶叶定额准运证和完税证明，每引准运茶一担，也就是100斤（旧制）。这个引票是发给内地商人的，藏民没有资格进内地经商。为防止一引多用，引票用完后必须在发引处交回。茶叶运输需要时间，引票交回也需要时间（有时甚至是两三年），又由于先领引票，后买茶叶，因此，一年中发放引票的数量是法定3 000引，但每年交引票的却比这个数字小一些，也就是说茶叶进藏量达不到3 000担。这从当时各关隘所收茶税数少于法定数可以证明。



上图是清代叙永直隶厅文稿原件的照片，说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领引的四川永宁县茶商王富斌因为“误课”，也就是没有按所领引票完成贩茶上税任务，他的茶商资格被吊销，由一个家境富裕的16岁的新茶商陈建忠所取代。每个茶商在领取引票时，必须有人担保，有人公证，同时交纳课税。贩售茶叶时，必须持有引票和一个关于相貌的说明文件，以防假冒。同时，引票上还要注明销售方向。上述两茶商所领茶引是在永宁销售的茶引，称为“腹引”，在边境销售的茶称为“边引”。如无法完成，将被吊销，如果逃逸，还要通缉追捕。

既然3 000担都达不到，那很多书籍所说的进藏茶叶每年3万担或者6万担只能是今人安给古人的良好的幻想。笔者一直想追溯这一说法的原始出处，可惜，总是无功而返。笔者想从侧面，也就是川、陕五茶马司出关茶叶的减少量来印证，也没有迹象可以支持这一说法。



从这张20世纪20年代的老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按当时的概念，架布、倚邦、革登茶山离思茅相当近，一度，他们是通往车里的主干道。而普洱茶产地（广义的六大茶山）包含普藤以南，包括车里的大门口——攸乐茶山到现在边境的曼腊、曼乃和现属老挝的勐乌、乌得（他们是两个独立的版纳）等地，这是一个包含几个版纳的相当大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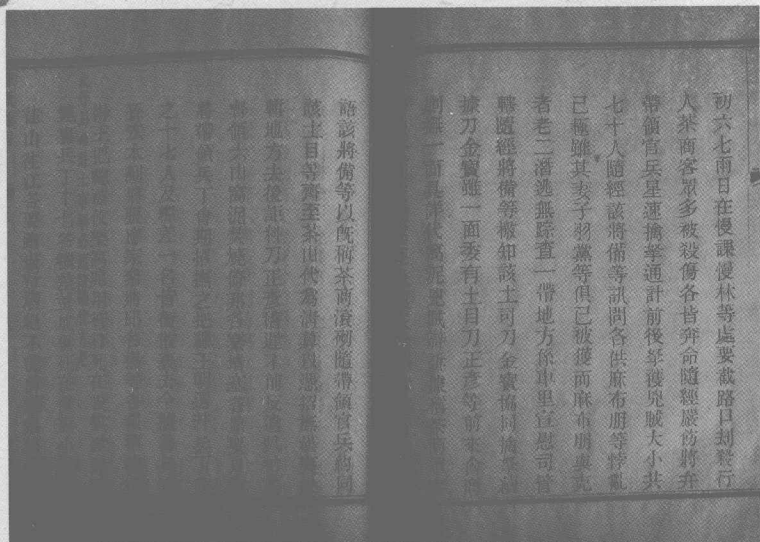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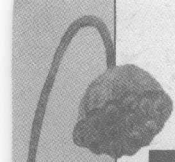
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

康熙朝，云南开始整顿云南的茶业，云南的都督和巡抚也开始将普洱茶作为土贡于每年端午节前进贡。由于丽江已“改土归流”（也就是在过去的土司统治区设立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员，管理当地的政治经济），且交通较永胜方便，因此，茶市移至丽江、中甸。

此时，普洱已划给元江府，六大茶山还在车里宣慰司管理之下。当时的车里宣慰司共有普簾、猛旺、整董、猛乌、乌得、车里、六困、倚邦、易武、猛腊、猛遮、猛龙、猛往等十三个版纳（版纳，傣语，直译为千亩田，是车里宣慰司治下的第二大行政、税收单位），“十二版纳”（傣语，音西双版纳）一词，当时在汉人的词汇里并不太流行。茶业的兴旺，给十三版纳带来了各地的客商，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未曾想到的灾难。

此时的六大茶山，商贾云集，各省商人纷纷来采购茶叶，贩运牟利，他们中，江西籍商人的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是有目共睹的。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几个江西商人在茶山收茶，和借宿地的主人麻布朋发生矛盾。《滇云历年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莽芝（茶山）产茶，商贩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有江西客淫麻布朋之妻，事露，麻布朋杀江西客，而割发辫传示诸商。于是诸商以被盗截杀闻，且言：‘是橄榄坝舍目刀正彦指使。’正彦素有富名，谓其由于盗也。”鄂尔泰听报土司刀正彦“号召窝泥（今哈尼族），肆行劫商害民”，开始造反，正在忙于镇压乌蒙（今昭通）土司暴动的他立即命提督郝玉麟派兵镇压。在倚邦、攸乐及澜沧江以内，当地各山的少数民族聚集起来，与围剿的官军展开山地战，由于官军不熟悉地形，多次受到重大打击，损失惨重。然而，乌合之众毕竟难敌训练有素的官军。第二年，麻布朋被擒，又是在猛腊茶山，橄榄坝土司刀正彦也被参将邱名扬抓获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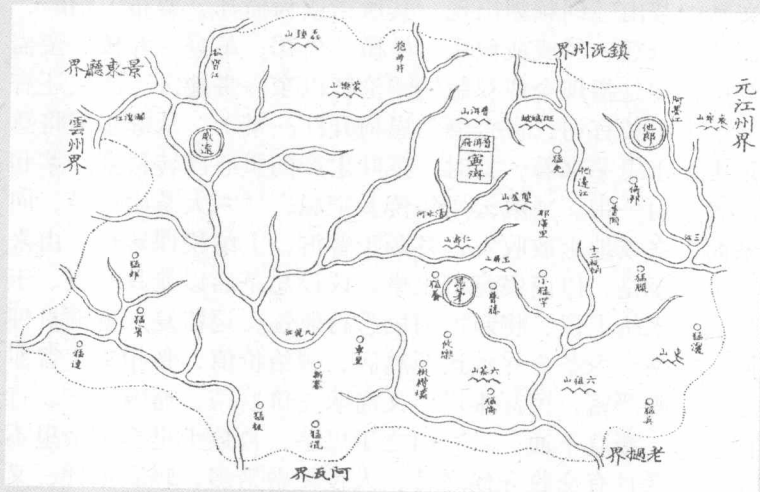
对李定国、刀正彦的两次进剿，使人民流失，生产停



麻布朋事件的另一种说法，见鄂尔泰奏折。红字为雍正的朱批

顿，当地土著纷纷逃往南掌国（今老挝），事后招其回家生产，颇费时间和精力。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茶山问题，不使那些与清政府作对的人一遇追剿，就以茶山作为逃避之地，茶山被围，就逃境外，“入则藉采茶以资生，出则凭劫掠为活计”，鄂尔泰建议在茶山改土归流，在十三版纳中澜沧江以东（江内）的六版纳，限制土司的势力，设立流官。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普洱府设立，在思茅设通判，橄榄坝、倚邦、猛乌（现属老挝）三处，各设把总一员，带兵驻扎。这样，六大茶山完全在官军的掌控之下了。为了避免茶商与当地土著茶农之间的各种矛盾，鄂尔泰向皇上建议“茶山，系车里咽喉之地，请将普洱原设通判移驻思茅，任职扑盗经管思茅六茶山事务。从前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茶山产茶，每年约六七千驮。即于适中之地，设立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客人上山，永可杜绝弊端。客商买茶，每驮约纳茶税银三钱，令通判管理。试行一年之后，征税若干，定额报部”。也就是说，六茶山产茶六七千驮（按每驮120市斤计算，总量在七八千市担之间），

这些茶必须运到设于思茅的总茶店交易。把所有权力收到官家手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却助长了腐败与更普遍的欺压。另一方面，鄂尔泰的报告比在茶山围剿起义的提督郝玉麟向皇帝报告的“访问茶山大局，据称，茶山地方甚属辽阔，每年所产普茶，不下百万余斤”为少，不知这是一种正常的误差还是因为围剿导致的茶叶产量萎缩。



嘉庆普洱府图

云南历史上就产茶，但在不同时期产量有多大却颇有疑问。唐朝时，云南茶还没有“采造法”；宋、元时期，云南有茶叶小额贸易，但仍被中央政府认为不产茶；云南茶业的兴盛，始于明代。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说：“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置子之意也。今人尤名其礼曰下茶。南中夷人定亲，必不可无，但有多寡。礼失而求诸野，今求诸夷矣。”对南中（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保存中原茶礼大为赞叹，说明茶在云南人生活中地位相当重要。也就是在这时，我们在文献中看到了普洱茶（当时叫普茶）的踪影。刘文征在《滇志》中记载：“（由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



之普耳山，其山产茶。又有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头目居之，蜀汉孔明营垒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广可千里，其中养象，其山亦为孔明寄箭处。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辩字矣。又行四日，始到车里宣慰司。”（明朝普耳的“耳”没有三点水，普耳山一般认为就是现在普洱县城西边的西门山）也就是说，当时的普耳即是车里和内地交通的孔道，那里也有茶叶出产。然而，到了清朝，我们看到，各种文献中茶山一词频频出现，其所指或为倚邦、架布、崙崙、蛮砖、革登、易武或攸乐、曼撒、倚邦、革登、莽枝、蛮崙等山，均是指现今西双版纳澜沧江以东一带地区（清代还有一个茶山长官司，在今缅甸恩梅开江一带）。从鄂尔泰将总茶店设于思茅来看，其时，茶叶生产的重心已转移到思茅和六大茶山一带。《滇云历年传》记载，“六大茶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于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留复入者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戡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赅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普洱府对于驱赶商贩、减少商民摩擦是下了狠手的。然而，这种手段却又给商民带来新的更大烦恼，因为官民之间的矛盾对草根阶层来说，较之民商矛盾更难以解决。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茶山土官刀兴国因为受不了官府的压迫，联合苦聪人、元江土著一起围攻普洱府城。为镇压起义，清政府派出大量官兵，对当地土著居民滥开杀戮，“攻剿贼首刀兴国及贼眷共五百余名，斩杀逆贼三千六百